

媒介化团结：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研究

——以 Z 省 N 市 Y 区的公益实践为例

王翠荣

摘要：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作为“积极老龄化”的践行者，通过主动参与基层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完成从“生存焦虑”向“价值创造”的角色转型，而且依托数字媒介形成新的互助共同体，提升社会参与感与自我效能感。研究立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进程深度交汇的时代语境，借助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聚焦 Z 省 N 市 Y 区这一共同富裕首善之区的银龄志愿者群体，旨在探讨其在再社会化进程中媒介化团结的生成机制与实践逻辑，并力求破解其融入数字社会的现实困境。研究表明，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团结”是数字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及基层传播中的重要创新，因此需要通过相应的技术支持及制度保障，推动该群体的服务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再社会化；媒介化团结；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3-0016-13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3NDJC248YB)

一、研究缘起

当前我国同时面临两个深刻变化：一方面是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是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据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为 140489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 32338 万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2365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1307 万人和 342 万人^[1]。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5 亿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网民互联网使用率达 53.7%^[2]。规模庞大的银龄群体退休后，普遍面临从传统社会结构与职业角色中“脱嵌”的困境。他们该如何探寻新的社会角色、利用互联网重构社会联结，这是值得学界持续关注核心议题。

在今天这个分化多元的社会中，能够获得社会成员普遍认同、接受进而激发出社会成员之敬重感的，只能是作为“重叠共识”的公德^[3]，例如以增进社会整体福祉为代表的志愿服务工作。城镇银龄(通常指 60 岁及以上)志愿者群体的服务行为比较容易得到积极反馈，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与生活意义感，进而促进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4]。因此，一部分“角色退出”后投入志愿服务工作的老年人，非但没有走向社会边缘，反而借助数字媒介主动完成新一轮的社会化，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而流动的团结形式，成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不容小觑的骨干力量。同时，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的时代浪潮中，老年人群体参与数字实践所反映的数字鸿沟现象日益显著^[5]，数字区隔下老年人在从事志愿服务活动中也存在参与的不平等现象，从而影响部分志愿者的社会融入。

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再社会化”这一主线，拟探究“媒介化团结”在城镇银龄志愿者共同体建构中的赋能路径与互动逻辑，希望能为破解城镇银龄群体社会融入困境、优化志愿服务组织效能，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逻辑

(一)再社会化:作为实践的资本转化与惯习重构

退休后的城镇老年人常伴随职业角色丧失引发的“角色真空”^{[6]103}。由于从劳动角色转换为被供养角色,从决策角色转换为平民角色,从工具角色转换为情感角色^[7],老人们往往表现得极不适应。有的老人甚至因受失落、孤独、抑郁、悲哀、恐惧等消极情绪的驱使过起“蜗居”生活,逐渐失去与社会的联结性。而“联结性”是老年人实现更有意义、更积极和更有目的生活的关键机制。这种“联结性”主要体现在有事做、有关系、有希望、有连续性。为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失落感,老人们常常迫切需要通过继续参与社会活动来证明自身价值,维持社会连接,实现“再社会化”。

社会化是一个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与教育学范畴的名词,指的是人类学习、继承各种社会规范、传统、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元素,并逐渐适应于其中的过程^{[8]122}。传统社会化理论一般以过程特征为依据,将社会化区分为五种类型——初始社会化、预期社会化、发展社会化、逆向社会化、再社会化^{[9]83-84}。其中,“再社会化”通常指“个人从原有生活方式,向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转变、适应和发展的过程”^{[10]25},或者“在一种与原有经验环境不同的新规范与价值里,个人重新社会化的过程”^{[11]188}。有学者指出,再社会化就是指个人在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舍弃原有的行为观念,接受新的行为规范的过程^{[12]130};还有学者强调再社会化是一种社会行动,一种动态的行为过程,其内涵应包括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心理状态、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5个基本要素^[13]。

在与社会环境的持续性互动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能够有效改善自身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险、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并增强生活幸福感,从而总体上显著地提高福祉水平^[14];特别是“老年人在退出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活动后,回归社区生活,可以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15]。本研究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突破年龄及角色限制,通过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重构社会身份的过程视为“再社会化”过程。其表征是他们为适应新的生活状态、社会角色和时代发展,主动或被动学习新知识、技能与行为规范,重塑自身社会价值。

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将社会实践视为“惯习”“资本”“场域”三者动态作用的产物。这一视角极大地深化研究者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再社会化”的理解。布迪厄认为,只有惯习、场域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生成实践。惯习也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这些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16]165}。退休意味着城镇老年人从“职业场域”退出,进入一个全新的、初具雏形的“社区场域”。作为城镇老年人典范的银龄志愿者,在再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志愿服务努力打造“多元主体立足共同空间的地缘共同体、实现社会力量有机整合的价值共同体、基于共同行动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共同体、激活公共精神增强交往认同的情感共同体”^[17]。他们的再社会化不仅是角色的转变,更是身体惯习的调整。在这个新场域中,他们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其生命历程中积累的经济资本(如财产及各种经济利益)、文化资本(如知识和技能)、社会资本(如人脉关系网络)等重新回到社会。因此,成功的再社会化,恰恰体现在他们将自身积累的部分资本在志愿服务的场域中进行“再投资”与“再转化”,从而获得新的象征资本(尊重、声望)和存在意义的实践过程。当然,成功者会成为场域中的“精英”,而难以适应者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媒介化团结:媒介建构的实践与连接

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前现代社会保持时间和空间的紧密关联及身体的在场,而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则派生于时空的分离与重组的“脱域”过程^{[18]16}。在这一变迁中,“媒介作为基础设施可被视为关系研究的关键变量,它通过组织时空、培养惯习、重构权力等方式逐步实现对关系形态和关系文化的重塑”^[19]。现代媒介已经与人们的集体身份、社会关系和行动逻辑深度融合,成为一种新型团结关系的重要场域。媒介正通过日常传播活动的融合重塑社会关系。这种融合不仅改变信息传播的方式,还影响人们的社会互动和关系构建^[20]。“媒介在发挥中介作用,使自身成为媒介的同时,也

在规定着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特定秩序,通过生成时空、场景与实践,制造感知、经验与权力关系,持续地建构着社会”^[21]。同时,媒介不再仅仅是工具,其本身的逻辑、技术和平台特性也已深度嵌入并重塑团结本身的形态、生产过程和体验。

Fenton 较早地对社会运动如何通过网络技术构建联结与协作进行分析,指出这种被中介的团结不是线性的,而是由弥散的联合体构成、变化和重组的^[22]。在媒介化社会结构中,数字媒介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能够激发、引导或限制特定的情感经验,使这些情感经验在媒介实践中可被传递、共享与聚集,从而在媒介化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新的情感联结与群体性^[23]。国内有学者结合对社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媒介化逻辑是地域性网络社区形成的重要力量,媒介在促进社区团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媒介化逻辑主要体现在促进群体聚合、培育共同意识、推动集体行动等方面,并将基于数字媒介的社区再组织过程称之为“媒介化团结”^[24]。作为数字时代社会联结的新范式,媒介化团结通过媒介技术在虚实交互中形成动态协作的集体行动力,其本质是技术中介的社会团结形态转型,这既延续传统团结理论的核心关切,又呈现出独特的运作机制。

毋庸讳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向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急速渗透正在重构社会团结,技术变革带来社会联结机制的变革,进而带来社会团结形态的变革。数智时代的变革还在于社会团结主体的变革,从纯粹人类社会团结转变为人机共生的社会团结^[25]。这种团结重构城镇银龄志愿者的关系网络、情感结构与行动逻辑,让媒介不仅成为连接工具,更成为传递善意、弘扬公益精神的助推器。同时,技术从效率工具到社会关系的演化已经发生在从国家治理到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中,且正在渗透进每一个细节^[26]。在快速迭代的技术化社会,怎样切实保障银龄群体跟上时代的步伐,使其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值得学界和业界深入探讨的课题。

基于上述梳理,本研究将以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如下问题:该群体如何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更好地实现角色转型与身份重构?如何在媒介技术驱动下构建新型团结形态,并最终助力基层治理和社会文明进步?数字技术在促进广泛连接的同时,又会面临哪些困境?相关管理部门及社会如何更好地完善顶层设计和保障体系,合理利用数字工具,为众多城镇银龄志愿者创造新的社会角色与行动空间?上述问题理应成为基层传播或社会治理等相关领域的关注焦点。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的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均来自 Z 省 N 市 Y 区。该区是我国首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自 2019 年起连续六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城区)并两次位列榜首(该活动 2019 年首次将市辖区纳入推选范围)。Y 区下辖 22 个镇街,常住人口约 169 万,城镇化率为 84%^[27],其中 65 岁以上老年人 16.61 万^[28]。同时期该区注册志愿者为 32.3 万人(60 周岁以上的城镇银龄志愿者近 7 万人,65 周岁以上的老年注册志愿者 4.5 万余人)^[29]。因此该区老年志愿服务工作具备国内第一梯队样本的代表性。

(一) 访谈对象及分析维度

研究者自 2022 年 5 月起关注 Z 省 Y 区的银龄志愿者群体。近几年足迹遍布该区 22 个镇街,在大范围的田野观察之中,重点接触 8 个镇街和 15 个社区的负责人,并在 10 余支银龄志愿服务团队中遴选 30 名骨干成员(编号为 F1~F30)。遴选时充分考虑到成员的性别、年龄、退休前职业、教育背景、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等分布情况,研究对象的选择尽量做到均衡且典型。调研通过多次线下及线上访谈,以文字、录音、拍照等形式进行资料搜集。2022 年 5 月—2024 年 11 月,在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城镇银龄志愿者活动频繁时段进行重点调研,参与式观察城镇银龄志愿者的服务过程及团队会议。调查时主要着眼于他们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个体经验及交往互动,确定访谈指标,关注他们的典型表现,进而展示他们角色重塑动因、志愿服务重心、媒介技术工具渗透程度及“媒介化团结”成效等实践结果。

表 1 核心分析维度及相关指标

分析维度	观察访谈的关键指标	典型表现
参与动机	角色认同转变、参与主动性高低与否	多数城镇银龄志愿者由“闲人”“负担”变为“能手”“专家”“老师”等;将志愿者身份纳入自我介绍的核心部分;由单纯执行任务到主动发现社会需求、提出新方案。
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介入	关系的建立及资源的利用等	许多城镇银龄志愿者乐于同陌生志愿者协作;多数成员将线上互动延伸至线下交往;某团队负责人(F2)曾带领团队成员常年为敬老院开展专场文艺演出,解决当地老人精神文化需求匮乏问题,并在志愿服务中主动调动自身人脉、物资、资金。
组织化程度	团队结构、活动规律性、与社区链接度、资源支持力度	城镇银龄志愿服务团队大多有固定的角色分工和成文章程、固定的场地及活动计划、接受社区党支部/居委会领导或指导、有相应物质、精神及志愿服务平台支持。
媒介使用深度	技术嵌入度、数字素养提升度、仪式性媒介行为、信息反馈强度	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对媒介平台驾轻就熟、使用媒介的种类及数量日益增多、微信群内即时协调任务、主动分享志愿服务故事与感悟、普遍关注线上分享后获得点赞及评论量。
服务效能	服务人次/规模、问题解决率、服务对象满意度	某城镇银龄志愿服务团队年度服务人次达 5000+,问题解决率超 90%,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显示 90%以上给予好评,多支城镇银龄志愿服务团队获得国内专业媒体宣传报道。

备注:本表系研究者结合调研情况整理而成。

(二) 访谈设计与编码分析

为系统获取城镇银龄志愿者的个体经验与交往互动细节,研究者基于表 1 中的五个核心维度,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参与者的动机演变、在志愿服务中相关社会关系及资源的利用情况、团队运作的结构化特征、数字媒介的嵌入性使用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研究过程中,重点聚焦受访者的叙事逻辑,捕捉其如何描述自身从“闲暇个体”到“效能主体”的角色转变历程等细节,这些叙事与行为的描述,构成后续三级编码分析的原始资料。

研究主要采用“主题分析”与“三级编码”相结合的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反复推敲和处理。将全部访谈转录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提取原始语句中的关键概念,如“从闲人到老师”“微信群协调”“社区指导”等;再进行主轴编码,将相近概念归类为子主题,如将“主动提方案”“拓展服务对象”归为“参与主动性”等;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整合为五大核心维度,形成与表 1 相呼应的主题结构。以此作为研究分析主线,确保研究发现紧密扎根于原始资料分析过程具备逻辑上的严谨性与透明度。

本研究结合质性内容分析与描述性统计,除对典型行为与言语进行深度阐释外,也对样本基本特征进行统计。30 名受访者中,男性占 46.7%,女性占 53.3%;年龄跨度为 62~86 岁,平均年龄 71.23 岁;教育背景涵盖初中至研究生,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占 20%左右;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具备基本数字工具使用能力,能熟练使用微信进行信息沟通、活动协调与内容分享,部分骨干成员还能利用短视频进行服务宣传。此外,受访者志愿服务平均年限为 7.5 年,最长者达 17 年,显示出其丰富的服务经验与参与的持续性。本研究既从质性角度深入挖掘城镇银龄志愿者的行为逻辑与情感动机,也借助基本特征统计增强样本代表性与结论说服力,确保研究发现扎根于真实、多元的个体经验。

四、从“被赡养者”到“价值创造者”：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跃迁

(一) 个体与社会的双重驱动

一般而言,“人的心理需求包括归属意识、主观自觉意识、生命有某种意义和方向,而社会角色就可以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30]12}。传统的老年学理论常将退休视为“社会撤离”的开始,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老年人适应衰老的途径,一是正确认识角色变换的客观必然性;二是积极参与社会寻求新的次一级角色”^{[31]115}。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包括经济型参与、政治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及文化型参与四种。“经济型参与,如再就业、创业等;政治型参与,如参与选举、建言献策、担任顾问等;社会型参与,如志愿服务、参与业委会等基层社会治理等;文化型参与,如参与慰问演出,休闲娱乐等”^[32]。无论哪种社会参与,都能使其展现自身能力与价值,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收获更高的幸福指数。

社会角色的履行及社会参与的影响可从“利己”和“利他”两个角度衡量。其中利己行为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追求个人幸福和快乐;利他行为通常源于同情、关爱和责任感,在不期望任何回报的情况下,自愿帮助他人或为他人提供利益的行为。二者完全可以协调统一。

访谈信息显示,Y区城镇银龄志愿者的初始动机多种多样,包括“闲下来不适应”“打发时间”“锻炼身体”“多交朋友”(老有所乐),但随着参与的深入,他们的核心动机普遍转向“发挥余热”“被需要的感觉很好”“用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到别人”(老有所为)。例如17年来坚持带领老伙伴们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常态化深入敬老院演出的“红蚂蚁”志愿服务总队负责人金老坦言:“我们唱老歌,跳老舞,以老助老,每月2次固定为3个敬老院服务,每年108场的演出,我们觉得现在这样活着才更有意义,他们开心我们更开心。”(F2)如今,这支团队已成为Z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城镇银龄志愿者团队,主创人金老师和老伴多次获得全国性表彰。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特长,与兴趣相投的老人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但后来,他们逐渐渴望以公益行动证明晚年社会价值,获得“被需要”的正向反馈。这支志愿服务队现已由最初一个分队16人发展至44个分队3885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500多人),并且实现跨地域的合作。“别看金老师80多岁了,身体好得很。她经常用自己的人脉吸引有爱心有能力的企业家,带着我们给敬老院和很多有需要的老人们送演出、送服务、送物资,带给他们欢声笑语。”(F3,F4)

一位退休5年来始终活跃在博物馆做志愿者的大学教授坦言:“站在博物馆里给参观者们讲文物、讲文化、讲我们国家光辉灿烂的历史,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老师,生命还有光。”(F27)“我们都老了,更懂彼此的难处,我的身体还行,搭把手,日子就不孤单了。”(F1)每天坚持看望并照顾80多岁独居老人的宣老用他质朴的语言传递着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可以说,志愿服务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色,使其不再仅仅是“退休人员”,而被赋予“社区导师”“公益服务者”“助老敬老典范”等新身份。这样不仅重新书写了老年人的社会脚本,而且使老年人的社会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大大增强。

(二) 资本转化与志愿服务场域的适配

与青少年期的社会化不同,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并非被动适应,而是建立在前期生命历程积累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基础上,根据过往职业经历、技能储备与业务素养形成差异化路径,转化为志愿场域的协作资本,并通过志愿服务进行积极的角色重塑,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延续与升华。老年人的再社会化也并非单纯受社会结构(如退休制度、年龄歧视)的制约。他们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以其持续不断的实践,反过来再生产或改变关于“老年”的社会结构。其行动本身,正是在重新定义“何谓有意义的老年生活”。

退休教师F13凭借多年教学经验,在隔代教养志愿服务中,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对社区儿童的学业辅导能力。几年来,他帮助10余名留守儿童提升学习成绩。在他看来,帮助有需要的孩子提高成绩,就是自己最大的快乐。一个藏在老旧社区的“全能男团”(“老吴帮邻工作坊”骨干成员的美誉)

由三位 70 岁以上精通各种日常维修业务的老爷爷组成,他们每天都准时去社区一个旧车棚改造的工作坊里“上班”。“我们社区属于老旧小区,老年人比较多,很多老人生活都比较节俭,用坏的家电家具、穿过的衣服、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不舍得扔掉,总要修修补补。刚好我们有点手艺嘛,社区还给我们提供一个场地,我们几个老伙计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帮帮邻居的忙喽。”(F5,F6,F7)这个工作坊几乎每天都有“业务”上门。“看他们仨有时忙不过来,我俩就来凑个热闹,没想到这一干也有两年了,自己这把老骨头还能派上用场,这比什么都强。”(F8,F9)他们的工作坊如今成了邻居经常光顾的“打卡点”和社区闲暇老人聚在一起聊天、切磋“技艺”的据点,“生意”一直红红火火。

在融个体能动性与社会支持于一体的再社会化实践中,城镇银龄志愿者作为经验丰富的社会成员,扮演着知识传授者、政策宣传员、文化传承者、社区建设者等多种角色,并借此重构社会角色,重建社会网络,重塑社会认同。如 75 岁的老潘自物业经理岗位退休后,为居民调解数千件矛盾纠纷,并手把手带出 100 多名“小潘”调解员,深受群众爱戴。他本人因此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以他为品牌创建的警调衔接工作机制,也已在全市推广开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拳头产品”。还有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政策宣传志愿服务,向居民解读养老政策、医保政策等,成为政策落地的重要助力者,从而实现从“生存型养老”向“发展型共治”的范式转型。

(三)官方认同与组织机制的保障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本质上是从以职业为核心的社会身份,向以社区服务和人际交往为核心的新社会身份的战略转移。这种转移不仅延缓其社会边缘化进程,更弥补基层行政管理人力不足的困境,使其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银色力量”。当然,基层管理部门也会提供多元的支持。比如许多社区会将志愿者的贡献从虚拟的积分转化为一种被官方认证的、可触摸的荣誉,每年都会举办隆重的志愿者表彰大会,颁发实体证书和奖杯,从而极大增强城镇银龄志愿者的信心,提升志愿服务的效能与韧性。

访谈中,Y 区社会工作部的魏部长表示:“‘专业社工+老年骨干’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因此,区里一直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鼓励街道和社区管理者创新管理方案,不断地给予志愿者们相应的政策扶持、物质和精神奖励,这样才能让老年志愿者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很多城镇银龄志愿者也强调街道或社区管理者的扶持非常重要。“单凭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社区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条件,还经常组织我们搞活动,我们当然会越来越有干劲儿。”(F29,F30)比如“红蚂蚁”志愿服务总队在 Y 区民政局的支持下,有着固定的十分宽敞的“办公”场所,团队成员在这里找到强烈的归属感。场地内设专门的舞蹈室、会议室、活动室、设备室等,志愿者们经常在其间排练节目,组织活动,商讨志愿服务对象及服务方案,周密筹划各个环节,确保服务质量、服务效果及成员自身的安全。

再比如“共享奶奶”志愿者团队在当地社区的大力扶持下,拥有十分完善的接送体系。社区管理者搭建“1 个社区+1 个‘共享奶奶’志愿者团队+多支社会力量”的接送模式:社工团队制定轮班表,让奶奶们以五人轮班制的形式,每周轮流参与志愿服务。团队依托网格化管理,通过社工的统筹管理工作,入户了解有接送孩子需求的家庭,并通过建立微信群进行线上“点单式服务”。当确定志愿者后,家长会将奶奶照片发给小朋友或学校教师,并向小朋友告知当日接送事宜,小朋友照片也提前发到微信工作群里让奶奶知晓。志愿奶奶们会提前去社区办公室领取“红马甲”工作服和工作牌,然后统一到学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有突发情况也会由社工及时通过电话或微信与家长、老师、志愿奶奶联络,从而实现管理者、志愿者与需求者的完美衔接。这种特殊模式的建构使城镇银龄志愿者完美嵌入基层治理末梢,创造老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样态,成为社区微更新、微治理的重要力量。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跃迁路径如图 1 所示: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因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完成从“退休者”转变为“积极贡献者”的角色重塑、将技能经验转化为社区信任与网络的资本转化、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完美统一的价值创造过程。而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引导与社区支持则贯穿始终,成为激发该群体参与社区工作的关键外力和维系志愿服务成果的持续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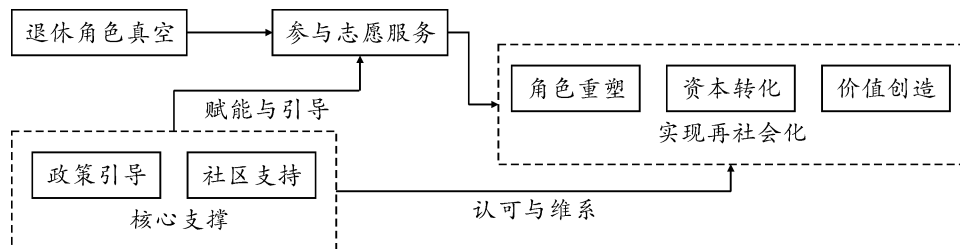


图1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跃迁路径

五、数字赋能与情感联结：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团结”

（一）行动者群组：基于高度共识的液态连接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当下文化环境中后现代性展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多元化正是液态社会的突出特征，“液化”使得我们正从一个前设的“参考群体”时代走向一个“普遍观照”的时代^{[33]10-12}。而“数字时代的技术革新不仅重塑社会交往形式，更赋予新型社会关系以流动联结性、虚实交互性、关系平台化、兼容复合性等独特属性。这些特性打破传统社会互动的固有边界，同时也拓展关系连接的深度和广度”^[34]。当前志愿服务过程中，许多城镇银龄志愿者通过日常传播活动的融合，重塑社会关系，形成“基于成员间共同的情感、价值观、信仰而集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合体”^[35]，并有意识通过情感化传播，使各类志愿服务升华为道德共同体符号，激发了全社会的密切关注。

正如梅罗维茨所言：“群体身份、社会化、等级制度，过去依赖于特定的物质地点以及其中可获取的特殊经验，现在这些方面已经被电子媒介改变了。”^{[36]122-12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一些便捷技术工具的广泛应用，微信群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交媒体工具及网络交往平台，在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服务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调研发现，Y区大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并经常使用微信来沟通信息、交流工作。一部分低龄老年志愿者甚至开设了自己的视频号、抖音账号，“现在大家都有智能手机嘛，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在微信里互相问个好，搞活动的时候也都喜欢拍些照片，做个小视频啥的，再分享到我们群里，这样大家开心得很。我的视频号也做得越来越好，都有上百个粉丝啦，接下来我还要把抖音号做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做的好事，也让社会风气越来越好！”（F3）粉丝们的点赞和评论往往更加激发志愿者们的自豪感，进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媒介技术团结更多的群友，顺利开展后续志愿服务工作。还有的城镇银龄志愿者在抖音、视频号等社交媒体上传浓缩自己人生经验或独家技艺的视频内容，将自身的服务故事转化为“积极老龄化”的文化符号，重构“智慧长者”身份，更获得广大青年群体的认可。

调研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志愿服务团队都建有微信群。因为微信群兼具信息发布、快速动员、经验交流和情感维系等多重功能，也是最具人情味的沟通平台，其语音功能对这些志愿者们非常友好。城镇银龄志愿者们都充分认可微信为他们带来的便利感及沉浸感。当研究者向一位70多岁的团队负责人提出加个微信的要求时，她马上拿出智能手机，迅速打开微信，“来，我扫你”，然后便熟练地操作起来。其间某个微信群偶尔会有消息提示，便返回去自然地用语音回应对方的信息。

Y区很多基层管理部门近几年也不断将开发的数字化工具渗透至日常管理中，并取得明显成效。比如该区设置的“鄞领志愿”微信小程序为志愿者们提供注册、培训、活动发布、报名、签到签退等服务功能，确保志愿者能够便捷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支持和激励。这种现代化工具实现志愿服务任务的线上发布、自主认领、时长记录和积分管理。当然，使用者多为相对“年轻”且有一定智能手机操作能力的志愿者（主要集中在60~70岁年龄段）。“现在抢任务像年轻人抢红包一样，手快有手慢无。”（F21，F24）这无疑表明该平台在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中已经实现很好的渗透和接受度，并将志愿服务变得可视化、可量化、游戏化。

(二)多元媒介的协同建构:社区媒介与专业媒体的双重赋能

在志愿服务信息的分享及宣传中,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媒介矩阵,丰富“媒介化团结”的表现形式。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为基于位置和地点的传播实践能让人们获得归属感和对环境的把握^[37]⁹⁷。社区媒介(常见的如社区文化墙、社区杂志、电梯轿厢海报等社区平面媒介,社区电子屏等视频媒介,社区微信公众号、微信群、钉钉群、小程序等社区网络媒介)作为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可以优先传播本地动态,通过报道社区银龄志愿服务活动等“重建‘附近’的生态联结”^[38]。许多社区媒介通过UGC机制赋能城镇银龄志愿者成为传播主体,城镇银龄志愿者们在与社区媒介的互动中也进一步增强与社区的连接性和志愿活动的影响力,使其从“在地化互助”转向“网络化协同”。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积极老龄化实践也成为专业媒体(如县级融媒体、省市级媒体、中央级媒体)的极好素材,专业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及仪式化传播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有效提升城镇银龄志愿者的社会影响力。它们的权威背书使银龄志愿服务可以突破地域局限,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符号。例如Y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的事迹被社区媒介作为典型予以宣传报道后,很快吸引十余家省、市、区三级媒体的高度关注,随后央广网、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级主流媒体进行跟踪报道,累计阅读量超上亿次。权威媒体的宣传积极推广该项目,不但带动当地269位老年人加入城镇银龄志愿者队伍,且将这种“共享+模式”经验分享到全国更多的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媒介作为“传感器”及时捕捉实践创新,专业媒体则作为“放大器”实现价值升华,从而形成由社区到社会的荣誉闭环,让志愿者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能见度”。“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项目获评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优秀案例等一系列荣誉;老潘警调中心负责人老潘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中国好人”等诸多称号,多家媒体将其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警调样板进行重点宣传;“春节不打烊”的“老吴帮邻工作坊”被央视等多家媒体报道后,获得全国范围内的认可和赞誉。“央视说我们是‘全能男团’,这个我们喜欢。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上电视,但是上电视、上报纸能让更多的人做好事,那我们就更高兴了。”(F5)通过权威专业媒体的宣传和情感动员,不仅激活公众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的共情体验,而且以道德榜样的力量鼓舞着广大受众。

由此可见,基层媒介和其他各级专业媒体的联动,无疑形成跨媒介生态的共振机制,实现从个体叙事到群体行动的跃升。可以说,城镇银龄志愿者社群及社区媒介的初始传播,显示基层内容生产的“种子效应”,而区域媒体和中央级媒体作为“转译者”,又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社区媒介、社会爱心人士、政策制定者等异质行动者纳入同一意义网络,为志愿服务工作赋予新时代的符号意义,带来价值升华,从而构建起银龄志愿服务的媒介生态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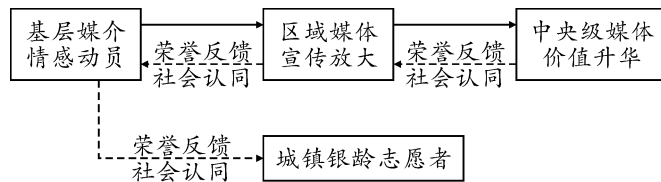


图2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媒介化团结传播机制

图2展现城镇银龄志愿者事迹的传播链条:从优秀城镇银龄志愿者事迹发端的基层情感动员,到区域媒体的宣传放大,最终经由中央级媒体完成价值的升华与定调。每一级传播都产生荣誉与社会认同,并反向输送回传播链条的起点,持续赋能城镇银龄志愿者,形成强大的“媒介化团结”效应。

这种模式既克服社区媒介的“地方性局限”，又避免部分层次较高的专业媒体报道不易“接地气”的困境，为老龄化社会治理注入媒介化新动能，勾勒了社区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美好图景。

（三）从赋能到压力：媒介化团结的隐性代价

访谈结果还表明：数字技术在赋予城镇银龄志愿者力量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群体内部的结构。我们看到的媒介化团结其实存在着“一体两面”，它既创造新的连接，也可能再生产甚至会滋生新的不平等。尽管数字媒介在城镇银龄志愿者组织中作用显著，但传统媒介使用方式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构建包容、稳定与深度的社区联结中，展现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比如线下口头传达和社区公告栏对于许多城镇银龄志愿者、特别是高龄志愿者而言，往往更为直接有效。相当一部分不大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城镇银龄志愿者，仍比较习惯接受线下口头传达、社区公告栏或电话等媒介。

以“老吴帮邻工作坊”为例，5位骨干成员中只有2位老人擅长使用智能手机与外界沟通，另外3位75岁以上的志愿者平时很少“触网”，他们每天都固定到工作坊“上班”，有人上门维修就赶紧行动起来，偶尔通过电话或邻居的口头传达“接单”。“我眼神不好，不爱看手机，也搞不懂现在那么多的智能设备，谁有事喊我或是有人通知我就行。”（F7）还有一些固定化、周期性的常规服务，总会有人在线下组织。与传统媒介相伴的面对面交流，团队成员之间的口口相传，是一种基于熟人的高效动员方式，能够构建比数字互动更为深厚、更值得信任的社会关系。

目前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所使用的媒介平台已呈现“新旧融合、多层并存”的鲜明特征。访谈结果显示，擅长新旧不同媒介的团队从事志愿服务后各有成效：使用小程序的团队，其服务响应速度更快，服务记录更完整，而且更容易承接跨社区的综合性任务。而依赖传统方式的团队，则在固定区域、熟人社会的服务中展现出更强的动员能力和持久性。一位社区书记由衷地感慨：“小程序帮我们筛选和激励最活跃的骨干，但真正能把大家凝聚到一起的，还是每次活动后电话或微信群里的那句‘大家辛苦了’。”“微信通知的优点是快，但公告栏往往‘不漏人’。我们楼里那位70多岁的陈奶奶，就是看公告栏参加今年的重阳节活动。”

研究发现，城镇银龄志愿者大多依赖的微信群“同步通信”模式和低准入门槛，也会导致信息洪流。因为该模式营造一种成员“始终在线”的语境。任何发言都会默认其他成员立即感知并处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相对较慢、视力不佳的银龄志愿者而言，大量的通知、链接、点赞和闲聊，不单单是便捷的“信息流”，也会成为令人焦虑的“信息压”。一些责任感强的银龄志愿者担心错过重要通知或需要回应的问题，往往会带来持续“在场”的压力。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特定场域需要特定的“惯习”。微信群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互动礼仪和价值观。那些能自然适应并展现此“数字惯习”的成员，更易获得认可。而习惯于面对面深度交流或不擅于在数字空间进行自我营销的成员，其表达方式和贡献则难以被充分认可，从而遭受一种隐形的文化排斥。调研中某社区一银龄志愿服务微信群因信息过载、意见分歧，导致部分志愿者退出群聊，致使团队凝聚力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冲击通过志愿服务建立起来的宝贵社会认同与情感联结。因此，如何避免规则缺失与领导力失灵，也是值得相关管理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六、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实践困境

本研究关注的Z省N市Y区银龄志愿者群体实践，恰恰是一场关于老龄化社会及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激励更多的老年人在技术与人本平衡的志愿生态中构建意义共同体的重要实验。推而广之，在我国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老有所为”的积极叙事背后，也潜藏着由本土社会结构与数字技术逻辑交织而成的深层困境。

（一）结构性数字鸿沟的存在

当今相关管理部门比较习惯依托志愿App、微信群建立组织网络，实现信息发布、任务分配、经验交流，以便提升组织化程度。然而一些数字工具在志愿服务中的推广并未充分考虑到老年群体的

异质性,由此便产生新的排斥效应。

一般而言,退休前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老人(如退休干部、教师、工程师),能快速适应数字平台,对新媒介工具和平台驾轻就熟,往往会成为活动的组织者和规则解释者。而另一类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边缘老人”(如高龄、低学历或普通退休工人)会因无法独立使用数字化服务系统,或因志愿服务数字平台界面复杂、打卡签到签退以及验证流程烦琐等,索性就不去参与相关志愿服务活动,这样无形中就会被排除在核心交流圈之外。因此,当数字资本成为新型“象征资本”,与原有文化资本(如教育背景)、社会资本(如职业网络)叠加时,往往会带来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分化。

尽管本研究所关注的Y区许多街道社区都定期组织老年人特别是银龄志愿者进行智能手机使用等技术培训,但社区培训次数有限,人手有限,无法真正弥合众多老人的技能鸿沟。此外,部分积分兑换的场地往往距离老人居住地较远,兑换的物品也不一定符合老人心意。如若通过线上邮寄又需要老人们熟悉相关线上操作流程,所以相当一部分从事志愿服务的老人都不去兑换积分。还有一些无法量化的情感陪伴、邻里关照等“隐性劳动”尽管对社区和谐至关重要,但在积分体系和表彰体系中几乎得不到体现。因此,当设计逻辑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习性不匹配时,就会制造新的参与壁垒。

(二)部分积分排名的异化

志愿服务积分制和排名榜的本意是量化贡献、激发积极性,但“在数字自我呈现行为中,人们通常会对呈现的内容加以修饰,以此建立理想化的、想象中他人更可能认可的数字自我形象,这种对于呈现行为结果的重视,会使人们在自我呈现中产生如何塑造更加完美的自我的社交焦虑”^[39],使得实践中容易走向反面,侵蚀志愿服务的内核。当“积分”和“排名”成为核心诉求,志愿服务的内驱力可能从价值理性(助人为乐)滑向工具理性(积累数据),导致“刷分式”志愿服务。

一位使用“鄞领志愿”小程序的退休干部感慨:“以前是做公益,心里轻松。现在积分一排名,看到自己落后了,脸上挂不住,好像不积极就成了落后分子。”这种由算法排名激发的“面子竞争”,一定程度上也将公共性的志愿服务异化为个体间的数字绩效比拼。因此,公开的排名会给志愿者(尤其是好胜心强的老年人)带来巨大的同辈压力和绩效焦虑。这不仅可能诱发超出身体负荷的过度服务,更会在团队内部制造紧张氛围,使合作关系蒙上竞争阴影,导致“志愿疲劳”和退出行为。

值得肯定的是,数字积分和排行榜作为一种“可见的”的量化工具,可以使志愿者的表现被衡量、比较和评判。这能令他们将外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从而进行自我规训。然而,当志愿服务与社区荣誉、个人声望高度绑定时,说“不”或选择退出,就需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和社交压力。多位社区书记在访谈中透露,他们会通过“荣誉退休+社区报到”机制,引导刚退休、有能力的党员和干部“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也承认,这种动员方式虽非强制,却带有强烈的行政引导色彩和道德期待,使个体难以拒绝。

(三)激励保障机制的单一

如前所述,许多基层管理部门都会通过一系列创新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采用数字化管理方式提高志愿服务记录的准确性和便捷性,或利用“时间银行”信用卡的形式,存储和支取志愿服务时间。然而现有部分激励体系尚不够多元,难以支撑该群体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初期的荣誉证书、公开表扬能给志愿者们带来满足感,但长期反复使用,其激励效果会逐渐衰减。当精神嘉奖无法转化为实质性的认可或生活便利时,就会显得空洞乏力。部分社区也缺乏对该群体青睐的兴趣特长培养、技能培训等通道,未能将志愿服务构建为一个促进群体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平台。

当前许多社区普遍缺乏针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风险保障。如在对规模庞大的红蚂蚁志愿服务总队的调研中发现,该团队的老人们在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之前都是自发签署风险承诺书,保证出现问题责任自担。其他团队也大多缺乏面向志愿者的专项保险,因参与志愿服务产生的交通、通信等成本也多由个人承担,这便使得志愿者在从事稍有风险的服务时心存顾虑。此外,一些基于项目和平台的团结固然灵活,但也高度依赖外部资源(如经费、运营等)和核心成员的热情,存在一定的

脆弱性和易逝性。一旦项目结束,共同体可能迅速消散,难以沉淀为持久、深厚的社会资本。

七、结论和讨论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团结”是数字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及基层传播中的重要创新。该群体借助志愿服务活动再社会化过程中促进自身的角色转型,并依托媒介化团结实现从“个体参与”到“群体团结”的转变,提升志愿服务效能与社会影响力,这在本质上是老龄化社会对传统治理范式的创造性回应。他们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文化符号和行为规范,正向引导和培育个体或群体的情感状态,形成共同的情感归属;通过形塑个体的思想与行为,使成员形成对共认价值理念的体察,并自觉追求社会共善的价值观念;通过不断丰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库,增强不同群体的文化互动,形成具有象征共同体精神的独特文化符号体系,并借助技能输出、知识传递、文化传承及传播等行为建构“老有所为”的意义符码。

然而,“与数字空间中的离身式互动不同,在物理空间当中,老人的身体在场能够确保其话语权通过身体媒介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40],数字技术在促进广泛连接的同时,又会制造新的鸿沟。为使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摆脱在媒介信息流中的被动局面与结构性困境,需通过相应的技术支持及制度保障,推动该群体的服务高质量发展。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路径:

第一,优化媒介界面供给,降低参与门槛。基于银龄群体的生理特征与操作习惯,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在志愿服务平台开发中重构低门槛、高容错的媒介交互系统,增设“长者模式”的专属界面。比如放大字体和按钮,简化流程,将核心功能(如“一键报名”“扫码签到”)置于首页,减少跳转和输入;在平台中全面嵌入语音交互功能,将服务流程拆解为语音指令引导(如“点击这里领取任务”),替代复杂的文字菜单。同时支持通过语音直接报名活动、查询积分、收听通知,将操作从“手动”变为“口动”;对于不便进行线上登记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加入线下老年志愿服务组织的方式申请实名注册,确保不同数字能力的老年人都能被纳入志愿服务体系。同时推行“数字伙伴”互助机制,鼓励高校青年志愿者或社区专职人员为银龄志愿者提供一对一的数字化辅导,帮助他们熟悉平台操作,将数字技能培训嵌入志愿服务日常,为“边缘老人”架设通往数字世界的桥梁。

第二,利用媒介平台的连接功能,完善资本转化路径。媒介平台的联结功能不再仅是简单的社交工具,而成为城镇银龄志愿者资本转化的核心枢纽。为进一步推动该群体在媒介化团结中的自主性与凝聚力,可利用社交平台的社群功能,按照志愿者的原职业领域建立职业身份社群,鼓励他们在社群内分享职业经验、专业技能,将零散的个人经验转化为可共享、可复用的文化资本,为后续志愿活动提供专业支撑。也可通过共同参与线上话题讨论、志愿任务接龙、公益知识竞答等活动,将原有的地缘、业缘优势转化为线上社群资本,并进一步延伸为跨社区、跨区域的社会网络。

第三,丰富积分兑换类型,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建议扩大“服务积分兑换”的范畴,将志愿服务记录与实物兑换、社区服务相挂钩,比如鼓励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并存储时间,确保其未来可兑换对等的照护服务或优先服务体系(优先接入社区食堂、日间照料中心、基础体检服务等),坚持物质与精神并重,即时与长远结合;倡导更加精细化的志愿服务岗位设计,明确标注每项服务的体力、技能要求,为城镇银龄志愿者提供适宜的、量力而行的服务岗位,引导志愿者根据自身情况“对号入座”,实现精准、安全的参与;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为老年志愿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或者将个体贡献转化为制度性认可,有意识地将线上形成的项目与合作固化为社区的制度及规范,让流动的媒介化团结凝聚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第四,倡导社会协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构建“社区—高校—企业”三方协同机制,鼓励社区联合高校、企业为城镇银龄志愿服务团队提供骨干培训、项目管理、积分兑换资源、资金赞助或专业技术支持,为志愿服务注入持续的资源与活力。如调研的Y区许多街道社区都与一些高校、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引导企业家及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加入银龄志愿者团队,以多种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可显著展示银龄志愿者群体的风采与贡献,将他们的事迹融入社区文化与历

史,使其获得最高级别的社区尊重与身份认同,营造“共同体”文化氛围;还可以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呼应”的传播矩阵,由基层(社区)媒介捕捉鲜活的一线故事,通过微信群、公告栏进行情感动员,营造“身边人学身边人”的浓厚氛围,而专业媒体(区域/中央)则需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价值,将其从“好人好事”框架提升至“积极老龄化中国实践”的叙事高度,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与价值认同。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区域特殊性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相关经验的推广存在显著影响,这也是经验落地过程中需重点考量的现实前提。我国不同区域的银龄群体结构特征、政策支持力度、基层社区的治理模式、媒介动员能力及地方文化氛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只有充分兼顾不同区域的特点,才能让媒介化团结真正赋能更多的群体,实现志愿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及公益慈善文化的创新性传播,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实践从一个朴素的善行,升华为一项有尊严、有力量、可持续的伟大的社会事业。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杨庆对本文亦有贡献,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王萍萍. 2025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40489万人 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国家统计局. (2026-01-19). [2026-02-25]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 [2] 李政葳.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02亿人. 光明日报, 2026-02-06(4).
- [3] 王小章. 结构、情感与道德:道德转型的社会学探索. 社会学研究, 2023(2):93-114+228.
- [4] 赛晓好. 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路径:基于志愿服务参与的视角.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 2025(2):121-145+196-197.
- [5] 刘金波, 刘沛彤. 跨越“双重鸿沟”:智能媒介促进城乡融合的逻辑及路径——基于S省T市J区高龄农民工手机使用的实证研究.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9):52-60.
- [6] 汪新建, 孙丽丽, 杨桂华. 社会心理学概论.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 [7] 王亚男, 朱奎泽. 新时代老年人再社会化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审视及实践路径. 老龄化研究, 2023(10):240-244.
- [8] 杨淑琴, 陈丹, 徐纬光, 等. 社会学导论.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3.
- [9] 郑杭生, 李强, 李路路, 等. 社会化概论新修. 3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李晓阳. 社会学基础.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 [11] 蔡文辉, 李绍嵘. 简明英汉社会学辞典.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赵立新.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研究.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4.
- [13] 刘慧萍, 曹梅娟. 再社会化及其评估方法研究现状.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1(16):3595-3596.
- [14] 倪晨旭, 郭诗怡, 彭洋漾, 等. 新时代银龄行动: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23(2):68-83.
- [15] 鞠春彦, 李凯. “老有可为”: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实现积极老龄化. 人文杂志, 2020(6):112-119.
- [16]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17] 和思鹏, 李晨曦.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理据、实践进路与价值意蕴. 贵州社会科学, 2024(11):34-41.
- [18]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 [19] 李红, 刘慧钰. 关系研究与本土传播:一种媒介化的视野. 中州学刊, 2024(3):169-176.
- [20] 顾烨烨, 莫少群. 媒介化研究:理论溯源与研究路径. 全球传媒学刊, 2022(2):143-162.
- [21] 胡翼青, 湛知翼. 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作为世界的媒介. 新闻记者, 2022(10):3-15.
- [22] FENTON N. Mediating solidarity.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8, 4(1):37-57.
- [23] BAREITHER C. Doing emotion through digital media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media practices and emotional affordances. *Ethnologia Europaea*, 2019, 49(1):15-19.
- [24] 牛耀红. 媒介化团结:流动社会中的社区再造——基于地域性网络社区形成的过程性研究. 新闻大学, 2024(2):28-43+118.
- [25] 邱泽奇. 数智时代的人类团结——技术变革与理论重构. 智能社会研究, 2025(1):43-69+240-241.
- [26] 邱泽奇. 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社会科学文摘, 2019(2):58-61.
- [27] 王莎, 陈徐婷, 董婷婷, 等. 我区常住人口保持稳步增长. 鄞州日报, 2024-07-11(1).

- [28] 王莎,董婷婷. 鄞州获评全国首批医养结合示范区. 鄞州日报,2024-01-31(1).
- [29] 王悦宁,魏辉.“鄞”为有你,“益”起同行. 宁波晚报,2024-12-06(A04、05).
- [30]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 [31] 刘静林. 老年社会工作.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 [32] 梁贤艳. 城市老年人的精神养老图景及其实现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5):93-102.
- [33] 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欧阳景根,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2.
- [34] 李小波. 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关系:生成逻辑、或然风险与治理回应.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37-52.
- [35] 周永根. 情感共同体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湖南社会科学,2025(4):131-139.
- [36] 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37] 麦夸尔. 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 潘霁,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 [38] 张翠娥,黄经纬. 重建“附近”: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在地化路径. 浙江学刊,2024(4):146-152.
- [39] 黄慧,韩传喜. 意识形态“唤问”与自我决定:数字自我呈现行为的异化根源与出路.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2):54-62.
- [40] 宣长春,侯雨飞. 重识老龄传播:空间、身体与老人的再社会化.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16-127.

Mediated Solidarity——a Resocialization Study of Urban Senior Volunteer Groups: A Case Study of Public Welfare Practices in Y District, N City, Z Province

Wang Cuirong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practitioners of “active aging,” urban senior volunteer groups not only transition from a state of “survival anxiety” to “value creation”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volunteer activities, but also form new mutual-aid communities via digital media,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elf-efficacy. Rooted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d social digitalization intersect deeply, this study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eld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ing on the senior volunteer group in Y District, N City, Z Province—a model area for common prosperity—it aim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mediated solidarity during their resocialization process, while seeking to resolve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he intergration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mediated solidarity” of urban senior volunteer group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is group’s services through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active aging; urban senior volunteer groups; resocialization; mediated solidarity;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 收稿日期:2025-11-24

■ 作者单位:王翠荣,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 责任编辑:刘金波